

我国当代目录学研究的综述与展望

彭斐章 石宝军

本文在系统总结我国当代目录学研究的现状、揭示学科发展特点与规律的基础上,着重对拓展目录学研究领域、开展目录学史系统研究、加强书目编制与使用以及中外目录学交流等问题展开了评述。认为,当代目录学研究的特征表现在书目情报服务观念的变革,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的更加深化。目录学理论工作者应当把握好这一趋势,围绕目录学的基础理论、目录学史、目录学学科体系结构、书目情报理论、书目控制论、目录学研究方法和目录学的未来研究等论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中国目录学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同时,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广泛实用价值的学科。如果从刘氏父子类分典籍、始创叙录算起,它的产生和发展也已经历了两千多年,但作为一门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完整学科的形成,还是在本世纪20—30年代。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文献信息量的猛增,目录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目录学正由研究如何指导读书治学而逐步发展成为研究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导文献信息、以解决巨大的文献与人们对其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规律的科学。

一、我国目录学研究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目录学研究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据不完全统计,到1990年底,我国各类报刊发表的目录学论文共约1400余篇,其中,基础理论方面的文章149篇,约占论文总数的11%;目录学史522篇,占37%;专科目录学有164篇,占12%;书目编制与使用254篇,占18%;总论性文章130篇,占9%;国外译述105篇,占8%;目录学方法论55篇,占4%;其它27篇,占2%左右。

相应出版的目录学理论著作,有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中华书局1963年版)、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来新夏的《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1981年版)、武大与北大合编的《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1982年版)、徐召勋的《学点目录学》(安徽教育出版社)、罗孟桢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吕绍虞的《中国目录学史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倪波与王锦贵的《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彭斐章等编的《目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谢灼华的《中国文学目录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杨沛超的《目录学教程》(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倪晓建主编的《书目工作概论》(北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彭斐章的《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和来新夏的《古典目录学》(中华书局1991年版),以及王知津等翻译的《索引的概念与方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彭斐章等翻译的《目录学普通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焦玉英等翻译的《自然科学书目学》(科技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和赖茂生与王知津合译的《文摘的概念与方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等40余部。其中,除重印和再版了新中国成立前的部分著作外,绝大多数都是80年代以来我国目录学研究者的新著。从以上著述的主题分布与内容分析来看,我国当代目录学研究的特点不仅表现在研究内容的拓宽以及实用性的加强方面,目录学研究的方式方法及其学科体系结构也日臻完善起来。

首先,在基础理论问题上,我国广大目录学研究者一向视之为本学科研究的重点,不惜笔墨地对之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和探讨。这种研讨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①,研究内容主要是围绕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定义、学科结构及其理论基础等问题而展开。第一阶段是在归纳与综述前人有关论述和观点的基础上进行概述;第二阶段则是对前一阶段研究的继续,以其它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目录学的某些基础理论问题进行解释,从而逐步形成当代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总格局。

譬如,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早在50年代末,陈光祚便在其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的“目录学的对象和任务”一文中提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用书目索引的方式通报图书和宣传图书的规律”^②的观点。随后,朱天俊、周学浩、张遵俭、王熙华、王文杰等也都相继参加了讨论,提出“图书说”、“目录说”、“关系说”等多种论点。70年代后期,人们又在回顾、总结并分析以往认识的基础上,从多种不同的认识角度阐发了一些新的见解。1980年初,彭斐章、谢灼华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了“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揭示与报导图书资料与人们对图书资料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目录学领域里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也就是目录学的研究对象”^③。这一思想,曾在他们主持并参加编写的《目录学概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较大的反响,它不仅确立了“矛盾说”的论点,得到许多目录学同仁的赞同,也把对相应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与此同时,孟昭晋、孙二虎等人也曾就目录学对象问题展开过归纳与分析,提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目录事业”等论点。

1983年,陈一阳发表了“目录学是研究对所有图书文献资料实行目录控制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④的见解,坚持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目录”。陈耀盛则从“目录学是目录活动实践经验材料思维加工的结晶”^⑤的认识角度,提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多层次、多维的“目录活动”。1990年初,陈光祚又在《图书情报工作》杂志发表了“对目录学对象的再认识”一文,提出“目录学是研究文献流的整序、测度和导向的科学”^⑥的论点,认为当代目录学研究就是把文献流作为一个整体,探索其运动的规、内部构成的变化,特别是研究文献流的整序、测度与导向。应该说,他的这一论述主要是以其对文献的宏观控制思想为出发点。而诸家学说也多已开始注意到了从目录学学科自身发展的特殊矛盾及其目录活动的本质与发展规律角度去探讨目录学的实质。

近年来,我国目录学界曾有组织地对有关基础理论问题展开了一些讨论。中国图书馆学会目录学分会曾于1983年和1991年先后在沈阳和南京召开了两次“全国目录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一些专业刊物也曾先后组织了目录学基础理论专栏,为目录学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学术探讨与争鸣园地。除了对研究对象等内容的研讨外,在目录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上,有人认为目录学应属社会科学范畴,也有人提出目录学是一门横断科学的观点,但持前一观点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此外,由全国一些中青年目录学研究工作者组织发起的“目录学研究通讯小组”还曾在1987年前后专门组织了对“目录学理论基础”问题的讨论,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他们或坚持目录学的唯一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⑦,或认为目录学的理论基础应该是一个多层

次的体系结构,也即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信息科学和文化理论等共同构成^⑧。近两年,也有人提出大众传播理论或文献信息学都应作为目录学的理论基础的观点^⑨。一时间,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探讨目录学哲学基础的热潮,活跃了目录学理论研究的气氛。

其次,从现有统计不难看出,我国目录学界对目录学史的研究一直持有较浓厚的兴趣,论文发表的比重较大,这在某种程度上讲,也反映出人们在我国传统目录学研究上的一个优势与习惯。王晋卿的“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的主要成就”、谢德雄的“宋代目录学的发展及其成就”、林清的“元代目录学的发展及其成就初探”、谢国楨的“明清时代的目录学”以及陈超的“晚清目录学初探”等文章就曾分别对我国古代各个不同时期目录的编纂、著述及其与当时社会文化的联系、作用和影响等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评述。乔好勤的“略论我国1919—1949年的目录学”一文,也对民国时期目录学研究状况作了比较全面的综述。应当说,近年来所发表的目录学史的论著,较之姚名达、梁启超、王重民等老一辈目录学家的研究成果更具系统、广泛和注重探求社会影响与学科发展规规的特点。此外,关于我国目录学思想的研究,除了对诸如刘向、刘歆、毋煗、胡应麟、郑樵、王鸣盛、张之洞、章学诚、梁启超、陈垣、余嘉锡、姚名达等历代著名目录学家学术思想的研讨外,也不乏对今人,如王重民、钱亚新等目录学思想的探讨。由申畅等人编辑的《中国目录学家传略》和《中国目录学家辞典》,则又集中收录了我国历史上百余位目录学家的传记资料,先后于1987年和1988年分别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和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对于历代目录学著述及目录成果的评价和考证,研究较多的有《七志》、《七略》、《别录》、《七录》、《读书敏求记》、《史籍考》、《通志·校仇略》、《校仇通义》、《遂初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书目答问》、《西学书目表》和《生活全国总书目》以及有关“史志”目录等,着眼点主要研究诸书目、著述的编辑特点、学术价值、社会影响和历史功用。除发表的有关论文外,许多目录学论著或多或少地对目录学史论内容进行了阐述,或专设章节、或将相应内容穿插其中,王重民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和吕绍虞的《中国目录学史稿》则是当代系统研究我国古代目录学史的专著。近年来,人们还注意到从研究内容的跨时代、跨学科领域的纵横两方面的比较,为系统研究目录学史,继承和弘扬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打下了基础。

其三,当代关于专科学目录学的研究成果丰硕、方兴未艾。这从有关著述即可窥一斑,诸如来新夏的《古典目录学》、陈秉才等人的《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谢灼华的《中国文学目录学》,以及李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目录学》(1959年内部刊印)等著作便是在专科学目录学研究上的系统成果,其它象“医学文献目录学”、“文史文献目录学”、“数学文献目录学”等论述也都相继开始出现。1983年初,彭斐章、郭星寿在《图书馆杂志》发表了“加强马克思主义文献目录学的研究”一文,提出“马克思主义文献目录学是运用文献学、目录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揭示与报道马克思主义文献源及书目文献的一门科学”^⑩的论点。陈国铎则把专科学文献目录学定义为“在目录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结合某一专门学科的特点,研究如何全面、系统地指导这门学科的文獻状况,对具体文献的内容价值和学术源流作出简要、精当的揭示,以服务于特定对象的学科”^⑪。

1984年,黄景行在其“论专科学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一文中,提出应从学科目录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学科基本文献介绍和学科工具书等三个方面来建设和发展专科学目录学^⑫。柯平则从学科结构建设的角度把目录学的分支学科划分为三大类型,也即除了以研究某一学科文献及书目发展规律为本的专科学目录学外,还有目录学与其它学科交叉而形成的诸如书目

控制论、书目计量学、比较目录学等分支学科和由目录学领域自身内容和方法的突破而形成的新的分支学科,这包括文摘学、索引学、书目编纂学等等^⑬。

作为探讨目录学发生发展规律的一种有效方法和途径,比较目录学也已开始得到国内同仁的重视,在穆立平看来,比较目录学“旨在通过对不同环境中目录学的某些方面或问题的对比分析,了解异同,寻求正确理解和解释这种异同的原因,探求目录学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⑭柯平也曾就比较方法的运用、跨文化跨国家的研究、以及各种相关问题等角度,对比较目录学的特征和目的展开了探讨,“中西目录学比较研究”^⑮一文便是作者在这一论题上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讲,我国对比较目录学研究的重视程度及相应研究水平还不够。

其四,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书目情报工作中的广泛使用,整个书目情报工作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它已逐步成为当代目录学理论变革的先导。1983年,许文霞等人曾撰文指出,对于书目现象的概率统计与定量分析,能“展示确凿的数据以完善情报工作,了解学科发展动向,并用作学科研究及评价科技发展的重要依据”。^⑯邓洛华的“目录学与数学”一文也曾对数学方法应用于目录学研究进行了探讨。黄俊贵的“书目控制简论”一文则对UBC和NBC等基本概念、及其发展状况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提出“目录学是研究书目控制的理论、方法和历史的学科”^⑰的观点。彭斐章等人在“概论书目控制论”^⑱一文中,不仅对当代世界书目控制的历史与现状做了客观的反映,也为发展我国书目控制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所有这些都表明,人们已开始运用现代技术的理论与方法展开对目录学理论的立体探讨,从而加快了当代目录学理论研究的步伐。

以上所述,大致反映了我国当代目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状况,考察它的发展经历,一般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至6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的研究重点多集中在对目录学某些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以及书目编制与评价问题的讨论上,同时,也翻译介绍了大量国外、主要是苏联目录学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材料;二是自“文革”结束至今,目录学研究得以全方位发展,其中,尤在目录学基础理论、目录学史、专科目录学以及应用现代技术和知识展开对目录学相应问题的理论探讨上用力较深,并已注意到从目录学学科体系的整体结构角度探讨目录学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然而,其中也暴露了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在今后研究中去探讨。

二、关于我国当代目录学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评述

问题之一:应用当代科研成果及其与其它学科的相互交叉和运用,不仅使得目录学的研究内容日益丰富、学科家族逐步强大,也相应使得其理论结构渐趋丰满,既增强了理论系统性,又使得一些模糊的概念得以澄清。譬如,对文献流的测度已导致书目计量学或文献计量学这一新兴学科分支的诞生,而目录学与校勘学和版本学的区别,则在于它们对文献流的控制是属于群书宏观范畴还是对单篇文献和图书的微观范畴的不同处理^⑲。这种围绕文献流角度的解释方法明了而简洁。

毫无疑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给我国当代目录学研究带来了生机。随着一些新思想、新思维的出现,其中又不免会夹杂一些“浮噪”的论点,这是很正常的。所谓去伪存真、去浮求实,理应是每一位目录学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我们主张有针对性地对某些实质性的问题展开评述,不鼓励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概念”问题的争论上,但对一些基本“概念”又必须有清楚而统一的认识。譬如,在近年所出版或发表的某些目录学著述中,就时常出现同

一概念在同一篇文章或著作中前后不统一、或同一国外论著被译成两个不同概念的书名的现象,给当代目录学研究带来一些概念上的混乱。

此外,当今人们对科技专科目录学的研究少于对有关社科问题的探讨,研究方式也多习惯于传统的方法,这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是远不能适应当代目录学学科建设和发展需要的。因此,要确保目录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象这类问题很有必要及时解决。

问题之二:从我们对当代目录学史的论文统计来看,“文革”以前发表的关于目录学史的论文有47篇,占同期目录学论文发表总数的19%,而“文革”结束到1990年底共发表469篇,占同期论文总数的近41%,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们对该类问题研究的重视,而且研究的兴趣有增无减。显然,科学研究的特点正在于它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有继承才有发展,随着目录学研究的深入,进一步整理目录学遗产、扩大目录学史的研究内容,已经成为提高目录学研究水平、完善目录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进一步整理和扩大目录学史的研究内容必须建立在有的放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要抓住实质性的问题展开研究,也就是说,应讲求立足现实、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采取新的方法去继承和发展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光辉成就和优良传统,寻求社会背景下目录活动的内在规律。实际上,论文数字统计所表现出的较高比率,也并不能完全反应出我国目录学史研究的总体繁荣,其中还存在许多的漏洞和不足。譬如说,在现已发表的目录学史类论文中,就有许多重复前人劳动、人云亦云的现象,而在对前人著述及目录学思想的评价与研究上也缺乏新的认识和观点。尽管近年来人们在近现代目录学史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尚缺乏系统的研究,至今还没有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成的系统完整的中国目录学史问世,对一些目录学家的研究还存在空白。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引起重视。

显然,中国目录学要在世界目录学史上取得应有的地位并得以充分的反映,就必须首先对其自身的发展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只有这样,才便于我们写出以中国为主体的世界目录学史,努力从目录学的角度去弘扬我国的悠久历史与传统文化^⑩,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还须进一步加强。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开展对目录学思想的研究还必须注意坚持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而绝不能背上单求学科地位的思想去有意“攀高”,或牵强附会地对某些社会名流的言论断章取义、或根据“需要”而对其思想随意推理,动辄冠以“目录学家”或“目录学思想”,诸如“孔子的目录学思想”等等。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应作为我们研究目录学家及相应学术思想的前提。

问题之三:据统计,到1990年底,我国当代关于书目编制与使用方面的论文共发表254篇,约占论文总数的18%,其中,1965年以前的相应论文比率为同期论文总数的31.3%,而1976年以来的相应论文比率却只占同期论文总数的15%强,这种比值分布表明,人们对书目编制与使用问题研究兴趣的相对下降。

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致用”可谓目录学之生命线,是目录学最基本的特征。尽管许多人也时常在高喊以“辨章学术、指导读书治学”为目录学之核心功能,然而实际上对具体书目之编制理论与实践的探讨漠不关心。试想,缺少目录工作实践基础,何来目录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新的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显然必须建立在丰富的目录工作实践及对书目编制理论与方法的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否则,目录学的理论研究就会踏上闭门造车之路,以至理论与实践脱节,而影响整个目录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当前,目录学研究者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面向书目工作实际,解决书目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要注意和其他技术领域的专家携起手来,取长补短,不断提高书目工作的技术水平。目

录学理论工作者应该同时又是实际书目工作者,要投身书目工作实践活动,应用自己的理论和知识,或编辑出高质量的书目工具,或为科学研究提供第一流的书目服务,或在书目自动化方面大显身手^②。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有可能在更高理论与实践的层次上,打破传统陈旧观念的束缚,开拓目录学研究的新领域。

问题之四:50年代初期,我国目录学界开始侧重地翻译介绍了一些国外目录学著述,其中以苏联目录学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资料为多,这些译著给刚刚起步的中国目录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建设与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这种对译介国外目录学文献的兴趣却有所下降,仅就译文统计来看,1949—1965年我国译介国外目录学文章有54篇,占同期目录学论文总数的近22%,而1976—1990年的译介文章只有51篇,仅占同期论文总数的4.43%,译文的相对下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显然,忽视对当今国外目录学文献的译介与评述,就等于在迷阻自己的研究视线。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在书目控制论研究、书目数据库建设以及现代化的书目管理方法及其目录学理论体系上的研究,都很值得我们去了解、参考和借鉴。我国目录学在相应理论体条上的许多认识和观点,以及在目录实践中的许多问题上,有必要与国外同行展开交流,这既利于弘扬中国目录学的悠久历史与传统,也便于通过广泛的比较研究,取长补短,并努力在此基础上探求当代目录活动的规律,增进有我国特色之目录学。因此,注意及时译介国外目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加强中国目录学的外向宣传,也就成为当代目录学家的历史责任。

三、我国目录学的研究重点及其走向

当代目录学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其在信息时代大趋势的影响下所表现出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广泛的实用价值。运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信息学、情报学以及系统论、控制论、计算机与数学等学科知识从多角度、多方位对目录学研究内容的深化探讨,已使得目录学的研究内容大大拓宽,目录学的理论层次结构更趋科学和稳定。

纵观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展望信息时代目录学的未来,我们认为,中国当代目录学的研究主要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目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主要探讨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的指导下,目录学理论发展的社会动因及其目录工作的活动实质,继续寻求科学概念的统一,澄清目录学领域中某些理论混乱现象,探讨更为合理的目录学学科的理论体系结构);

2. 目录学史的研究(这包括对中国目录学学科发展史、目录学思想史、历代目录学与目录事业、目录学家的系统深化研究,以及对世界目录学史的研究等);

3. 目录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诸如社会科学文献目录学、自然学科文献目录学、图书发行目录学、书目编纂学和书目计量学等);

4. 书目情报理论的研究;

5. 书目控制论研究;

6. 目录学研究方法的研究;

7. 目录学的未来研究。

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据塔朗非所谓整体功能和属性一定大于其各个部分功能和属性简单相加的总和的原理,同样也适用于目录学研究以及整个目录工作的开展。尽管目前我国的书目检索工具已出版不少,但却普遍存在着彼此间的互不协调和统一,造成一些书目收录内容的交叉重复或互不衔接,以至现有的国家书目、联合目录、专题目录和检索刊物等系列书目检索工具间尚未形成一个严密的功能结构系统,这就提出了一个急需首先解决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加强目录工作的组织管理问题。实际上,国内外目录学研究及书目工作的

发展经历无疑表明,开展协调协作是使相应工作和研究能得到迅速和全面发展的保障。我国从50年代的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的编制到80年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等大型书目工具的编辑成功,从全国文献资源调查的顺利开展到现有一系列目录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出版,以及国外各种类型书目数据库的生产和联机书目检索服务的现状,都充分体现出“集约化发展”的趋势,反映出“协调协作”活动的必要。因此,科学研究成果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力量的联合,我们应当强调群体研究意识,注意将各方面的科研力量集中起来,围绕一些大型的、最重要的综合课题进行研究^②,这无疑应当成为我国当代目录学研究的一个长期的发展方向。

同样,在结合社会需要,强化具体目录编制及其方法、理论的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倡开展对诸如书目编纂学以及广义目录学等论题的探讨,自然也是目录学研究的内容范围,而重视目录学的研究方法则是推动目录学理论不断发展,增强学科生命力和提高理论层次的有效途径。我们主张广泛利用现有科研成果来充实和发展目录学理论与实践,鼓励研究的深化,提倡著书立说。但一个新观点的提出应该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应力求填补当代目录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无论是比较目录学研究,还是对其它新的目录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关键的问题是它能应用一定方法来完善整个目录学的学科体系,揭示目录学工作的发展规律,强化学科的生命力。要逐步使目录学在社会中显现其真正的实用价值与学科地位。

因此,广大目录学理论工作者应当注意把目录学研究着眼于书目工作与其它社会事业发展的相互联系上,努力从整体角度展开理论上的探讨。也就是说,要增强目录学研究的“社会意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部门,以提供情报服务或开展工作协作为桥梁,寻求社会所需课题,充实学科研究内容。一方面,它可使得当代目录学研究有据可依,便于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大量的“社交”活动,展示并宣传自身的功能与优势,扩大社会影响。同时,还可从相应劳动中,寻求必须的信息、资料与经济来源,扩充研究队伍,使目录学研究与多方效益直接挂钩。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当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规模或阶段,其研究内容往往会出现某种变革,这是科学研究对象自身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目录形式、目录学研究方法的巨大变革,带给我们的是目录学知识及研究方法体系的更加深化。而书目情报服务观念的变革、内容的拓展、方式方法的变化,也都已成为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来源,逐步形成目录学理论变革的先导,这是当代目录学研究的一个总的发展趋势^③。我们应当切实把握好这一趋势,在立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目录学的基础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去迎接信息时代向目录学提出的新的挑战。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 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可视为第一个阶段,70年代末至今为第二个阶段。

② 陈光祚:《目录学的对象和任务》,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版),1959年7月,第11~16页。

③ 彭斐章,谢灼华:《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1期,第90~96页。

④ 陈一阳:《目录学研究对象和定义新探》,载《图书情报工作》,1983年第4期,第1~5、25页。

⑤ 陈耀盛:《目录学多层次研究对象的辩证思考》,载《图书与情报》,1989年第1期,第53~60页。

⑥② 陈光祚:《目录学是研究文献流的整序、测度和导向的科学——对目录学对象的再认识》,载《图书情报工作》,1990年第1期,第1~7、30页。

(下转12页)

止,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共制定了32个公约,其中有18个已经生效。我国亦首先作为观察员于1986年11月、1987年3月,参加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特别会议。从1987年9月又正式作为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成员国参与讨论《死者遗产继承准据法公约》的制定,并向会议表述了我国的立场与观点。此外,上文也讲到,我国还正式加入了一个海牙公约。

但是,有必要强调指出,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国际私法的趋同化倾向的加强,并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走向,并不否认各国在采用同一立法原则、同一制度时,因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民族传统、法律习惯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也不否认法律的任何阶级属性。同时,也正如我们多次加以阐述的那样,国际私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仍将主要以国内法的形式存在。虽由于各国发展国际经济民事交流和合作的关系的共同愿望所推动,为减少这种交流和合作的法律障碍而加强的国际私法趋同化的影响,各国国际私法中接近的、比较协调一致的东西和属于国际法的因素会不断增加,但不应期望国际私法会完全演变成国际法,更不能否认各国国际私法因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传统的不同而必然具有的民族特征。



(上接117页)

⑦ 乔好勤:《关于目录学的理论基础》,载《河南图书馆学刊》,1987年第3期,第21~22页。

⑧ 陈传夫:《论目录学的理论基础——现状与体系》,载《湖北高校图书馆》,1986年第2期,第24~36页。

⑨ 葛民:《大众传播理论与目录学》,载《图书与情报》,1990年第1期,第74~78页;杨河源:《目录学的理论基础是文献信息学》,载《图书情报知识》,1991年第2期,第12~13、18页。

⑩ 彭斐章、郭星寿:《加强马克思主义文献目录学的研究》,载《图书馆杂志》,1983年第1期,第4~7页。

⑪ 陈国铎:《略论专科文献目录学》,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4年第4期,第22~24、29页。

⑫ 黄景行:《论专科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载《江苏图书馆学报》,1984年第2期,第1~5页。

⑬ 柯平:《略论目录学分支学科的建设》,载《河南图书馆学刊》,1988年第1期,第33、34~36页。

⑭ 穆立平:《略论比较目录学》,载《图书馆学刊》,1983年第4期,第41~46页。

⑮ 柯平:《中西目录学比较研究》,载《河南图书馆学刊》,1990年第1期,第33~37页。

⑯ 许文霞、刘迅:《书目计量学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国图书馆学会目录学专题讨论会论文》,1983年。

⑰ 黄俊贵:《书目控制简论》,载《图书馆学通讯》,1989年第3期,第35~37页。

⑱ 彭斐章等:《概论书目控制论》,载《图书情报论坛》,1990年第2期,第2~7、13页。

⑲ 彭斐章:《迎接信息时代的科学——目录学的现状与未来》,载《图书与情报》,1989年第4期,第2~6页。

⑳ 乔好勤:《当代目录学研究者的使命》,载《湖北高校图书馆》,1986年第3期,第51~53页。

㉑ 彭斐章:《评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的目录学研究》,载《图书情报知识》,1989年第3期,第2~6、31页。

㉒ 彭斐章:《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74页。